

革命老僑溫炳臣

鄧雲

忠黨愛國始終不渝

溫炳臣先生自髫齡旅居日本，加盟與中會，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，膽識過人，一生在日經商，而忠黨愛國，始終不渝，充分表現了愛國華僑的革命精神。溫先生生於民國前四十六年（清同治五年，西元一八六六年）十一月，本名芬，字炳臣，別號國勳，後以字行，原籍廣東省臺山縣大步頭村人（據馮自由著「革命逸史」說他是廣東南海人，日人菅原幸助著「日本の華僑」說他是廣東香山（即中山縣）人，今以溫先生逝世時治喪委員會之啓事為準）。他的父親學周先生是一位儒醫，善心仁術，曾做過村長，兼設私塾授徒，深得鄉人愛戴。炳臣先生幼年便在他父親的私塾讀書，課本是千字文、四書五經、幼學瓊林之類，溫先生記誦特強，為同儕所稱佩。溫先生有一位叔父名遇貴，在橫濱經商（根據馮自由著「革命逸史」）。溫先生十三歲時（民國前三十四年，西元一八七八年）便隨親屬赴橫濱，入經營茶葉的天祥洋行工作，開始了他的華僑生涯。他的弟弟名惠臣，以後也赴日本和

他住在一起（根據日人菅原幸助著「日本の華僑」）。他在洋行工作約四十年，後來改做棉絲買辦和經營煤炭販賣等生意約十餘年。民國十七年，他年已六十三歲，又代理安田火災保險。晚年家居，仍兼任僑團、僑校顧問等職務，為僑社服務。民國前十七年（西元一八九五年）溫先生三十歲，那年國父在廣州起義失敗，偕陳少白、鄧士良兩先生亡命到日本，由譚有發先生介紹到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經印刷店馮鏡如先生（馮自由先生的父親）處下榻，相見後，歡若平生。有一天國父和陳、鄧兩先生到中華會館參觀，回去時，見當道有滿清的黃龍旗升起，非常厭惡，便繞道回寓所，那知街道分歧，找不着歸路，剛好邂逅溫先生，國父便問溫先生道：「鄉里（粵語老鄉的意思），我想返文經印刷店，從何處去好呢？」溫先生便告知路線而別。當時，溫先生雖不認識國父，但覺得這位問路人氣度非凡，便暗記在心。適值橫濱一個華僑俱樂部「秀竹寄廬」（也有寫作「修竹」，不知何者為是）請一個新到的劇團吃飯，溫先生也參加，席上賓主談起時事，便說到國父已到日本，溫先生立即追問國父

年貌及其與文經印刷店關係，才知道那天問路的人，正是國父，不禁狂喜。

那時國父及陳少白、鄧士良兩先生在文經印刷店二樓，邀馮紫珊、譚有發、梁達卿、溫遇貴等十餘人會商組織興中會，推舉馮鏡如為會長，趙明樂為管庫，趙嶧琴為書記，馮紫珊、譚有發、黎炳垣等為幹事，會所設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，這是留日革命機關設立的開始。溫先生欽慕國父，由陳少白先生介紹，得以晉謁國父，聆聽國父革命救國的大志偉論，極為感動，便和鄧曉初、陳才、陳和、黃焯文、黎簡卿、陳植雲、馮懋龍（後易名自由）等十餘人繼續加入興中會為會員。後被滿清政府查悉，與中會成立僅十閱月，即被解散。不久，國父離日赴倫敦，陳少白先生仍留日，一切起居飲食，由溫先生招待。

領導僑胞盡力革命

民國前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九七年）溫先生三十二歲，正是國父倫敦蒙難後一年，國父自英經加拿大抵日，溫先生事先得到通知，便和陳少白先生等到橫濱碼頭迎接。國父和少白先生在山下町

同住，溫先生時來過從，擔任招待。日本志士宮崎寅藏（別號白浪滔天）欲晉謁國父，馮鏡如先生囑溫先生領見，宮崎贈國父以名劍，以資紀念。據溫先生晚年對人口述當時軼事，曾說：「有一天，日本志士社會黨首領宮崎寅藏奉東京民黨領袖犬養毅之託，特代表犬養毅恭請國父到東京相會。當宮崎寅藏到國父住處說明來意時，國父託詞須略延數日才能成行，宮崎寅藏便留下東京地址而別。第二天國父才對我說：『昨天本來是想和宮崎一起去東京的，無奈手頭旅費不足，所以不敢答應。』我聽了立即籌到日幣二百元奉給國父，全是一元小額鈔票，以便旅途零用。國父到東京後，暫寓於宮崎家中，仍時常回橫濱小住，下榻山下町，我常供給寢具什物。」云。

國父第二次到日本，在橫濱設立「中西學校」（大同學校、中華學校之前身）。後來康有為、梁啟超維新變法失敗之後，也逃抵日本，犬養毅、宮崎寅藏等人便竭力促成國父和康、梁合作，終因主張不同，未果。由於康有為主張保皇立憲，與國父的三民主義革命思想，水火不容，當時橫濱華僑也分為兩派，且曾為爭奪中西學校，發生爭執。起初，很多華僑認為國父所提倡的革命思想過新，因而支持者不多；但溫先生及其弟惠臣二人對國父的信仰，則未嘗稍變。

宮崎寅藏為日人贊助國父革命最早的志士，曾著「三十三年落花夢」記與中國革命史蹟甚詳，國父為之作序以表揚之。據溫先生說：當時日本犬養毅與國父過從甚密，抵掌談天下事，至為快慰。由於犬養毅的介紹，國父曾晤見大隈重信、

尾崎行雄、頭山滿等多人，這是國父與日本朝野重要人物交往的開始。民國前十四年（西元一八九八年），溫先生在橫濱山下町唐人街成立中和堂（陳少白先生命名），以聯絡華僑團體及國際友人志士為宗旨，日本進步黨總裁犬養毅、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及基督教牧師翟美徒等，常來晤談。是年國父命陳少白先生返香港創辦中國日報，於十二月出版。民國前十二年（西元一九〇〇年）惠州之役失敗後，國父率同志多人，聚集日本，共謀善後良策，每日聚餐者，輒數桌之衆，就是在溫先生家。是年夏，國父偕宮崎寅藏、平山周，自日本抵香港。不數日宮崎赴星加坡，被康有為誣陷下獄，國父會親往營救。旋又返日本，八月赴上海轉臺北，時臺灣總督兒玉甚敬仰國父，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命其促國父離臺，得大隈重信之助赴美，後又返日。溫先生則始終在日本領導僑胞，為革命而盡力。（本段參考陳國亭先生四十二年三月廿一日作「敬悼溫炳臣先生」，刊載中央日報）

民國前十一年（西元一九〇一年）二月十六日，國父致日本南方熊楠函中云：「溫炳臣亦寄語問候先生並貴昆季安好。」而所附致犬養毅為介紹南方熊楠函中則云：「弟嘗與先生談及昔年在英京獲交一貴國奇人南方熊楠君，……君遊歐美將二十年，博通數國語言文字，其哲學理學之精深，雖泰西專門名家，每為驚倒，而於植物學一門，尤為造詣。君無心名利，苦志於學，獨立特行，十餘年如一日，誠非人可及也。……」（以上見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），由此可見溫先生當

年與國父過從甚密，溫先生與日本知名之士亦時有交往，以協助革命工作之進行。

憂時憂國一片赤忱

民國前七年（西元一九〇五年），溫先生四十歲，國父赴日本成立中國同盟會，溫先生以幕僚身份隨侍國父左右，其弟惠臣亦加入為會員。據溫先生說，國父當時即住在他的山下町二一番地私宅，他一家人聚住二樓，騰出一樓給國父，以方便他聯絡日本志士宮崎寅藏、頭山滿等人及接待同志之用。國父飲食由其妻代為料理，國父不吸煙，少飲酒，惟嗜水果，因此常由其弟惠臣親往水果店送買水果。此時溫先生得以朝夕親承國父教益，如沐春風，引為畢生幸事。其弟惠臣自加入同盟會後，接受溫先生指示，為國父辦理採購事務。據說，有一天夜裏，運送包裹到橫濱港口，當時惠臣全然不知內裝何種物品，事後才曉得裏面裝有武器彈藥，想來不禁捏把冷汗。

不久，清廷偵知國父潛身在橫濱溫先生家，乃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，要求驅逐國父出境，而國父周遊世界各國，奔走革命，當感到旅途疲累懸念祖國而不能在祖國定居之時，仍潛返橫濱的山下町小住。根據有關方面的研究，國父前後共有九次居留日本橫濱，時常住在溫先生家。此固由於橫濱粵籍華僑較多，而同情與支持國父革命的日本友人和志士亦多之故；但溫先生兄弟効忠國父，友誼敦厚，竭盡全力保護其安全，照料其生活起居，亦為因素之一。

民國元年（西元一九一二年），溫先生四十七歲，國父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，溫先生特自日本僑居地前往南京道賀，和國父相見極為欣慰。當時領得「總統府出入門證」，溫先生深為感奮。三月一日，國父為了表揚他贊助革命為國効力的功勳，於百忙之中又以臨時大總統名義親署「旌義狀」頒賜溫先生，他尤引為殊榮。但此次回國，他在南京祇逗留月餘，仍返回日本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（西元一九三七年），溫先生七十二歲，是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我國全面抗戰，十二月十二日夜，日本當局開始逮捕留日中國國民黨黨員，溫先生被捕下獄，至同月三十日釋放，計被囚十八日。民國三十四年，抗戰勝利，我政府還都南京，三十五年，溫先生蒙先總統蔣公題賜玉照，並贈養老金，以示敬老之意。

民國四十一年，溫先生八十七歲，此時大陸已淪陷四年，他蒿目時艱，憂心忡忡，曾賦詩三首：

魯殿靈光讓炳臣，追隨總理廿餘春，
同年同月兼同寓，親炙如斯有幾人。
回首前塵與夢同，欣逢國父矢貞忠，
中原板蕩哀鴻淚，反共抗俄賴蔣公。
丙寅誕辰今壬辰，虛度韶光近九旬，
耄耋何求惟寄語，救民剝匪勿因循。

我們從這三首詩裏，不難體會到溫先生和國父友情的深厚與對先總統蔣公的信賴，更可以看出

他老當益壯，不忘國事，和志節的堅貞，眼光的遠大，以及憂時愛國的一片赤忱。

自三十八年大陸陷匪，溫先生義憤填膺，但他並不悲觀。他認為祇要大家信仰三民主義，團結一致，反攻大陸是必然成功的。所以他對橫濱黨務的開展，中華學校的改進，僑胞的團結互助，都盡了輔導的力量。猶憶民國四十年二月，彥彥擔任本黨中央第三組主任時，奉命視察日本黨務，宣慰僑胞，曾特別橫濱專誠拜訪溫先生，那時溫先生已八十六歲，年事雖高，仍然策杖步行，陪我遍訪黨部和當地僑團。當時黨部因新近收回未久，佈置整理都未臻完備，溫先生見到大為不滿，把手杖指着負責同志，嚴加責備，聲色俱厲。溫先生本來並不是慣於生氣的，不過他對黨務實在十分關切，見了不對的地方，便認為必須予以指正，他對促進橫濱黨務改造和僑胞的團結，確實有很大的貢獻。這種熱情、負責、認真與忠黨愛國的精神，真令人十分敬佩。當時他的身體仍很壯健，整天陪着我往返，毫無倦容，即此亦非常人可及。溫先生對民國元年國父親署旌義狀，視同拱璧，我到他家時，他曾珍重的拿出來給我，我知道他對這張旌義狀的重視，並不在為自己誇耀，而在這是國父給他的榮譽紀念品。他看到國父的署名，便彷彿看到國父當年的音容笑貌。我回憶當時情景，歷歷如在眼前，不能忘懷。

飾終盛典備極哀榮

這位一生忠黨愛國，曾參與創建民國的革命

老僑，終因年老體弱，不幸因心臟麻痺，於四十四年三月十三日，在橫濱市中區本牧町二丁目四〇七番地私宅與世長辭。遺夫人溫信子、媳陳少環、孫繼志。溫先生逝世時，尚任中國國民黨橫濱支部評議員、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顧問、橫濱中華中學董事會顧問、橫濱華僑總會顧問、留日廣東會館顧問等職。

當溫先生病重時，眼力已差，不能閱報，每日仍命家屬擇報紙要聞在榻旁朗誦。每晚七時，又命開收音機收聽臺灣廣播。三月十二日是國父逝世三十週年紀念日，每年此日，溫先生必率黨員同志和僑胞，舉行紀念儀式。據溫先生家屬的「溫委員炳臣臨終遺言」筆錄說，這天溫先生已入昏迷狀態，但到晚上七時，他忽然清醒，便召夫人到榻前囑咐道：「我最關心的是中華中學的發展和黨部的進步，現在孫總理與老朋友都來接我，正在外面等着，我要走了。你們不要驚動政府，也不可勞動親友。你們今後的日子，我給你們留下一所房子，變賣度日吧！我們關心大陳撤退後的情勢，但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。我走了，把我的手杖遞給我。」夫人把手杖遞給了他，他提了手杖，閉目自言自語道：「我要去東京參加總理逝世三十週年紀念。」說話時，兩手握着手杖向床外搖動三下，命取酒來，呷了一點，當時神態就好像到國父靈前敬酒的樣子。隨進了一點蜜柑，飲了一點開水，便不能言語而溘然長逝了。享年九十歲，可以算是一代元宿。

自溫先生逝世消息傳出，中日朝野莫不深自哀悼，當時我駐日大使董顯光先生及當地僑領百

餘人，發起組織治喪委員會，並為其遺族籌募生活教育基金。啓事中述溫先生生平謂：「髮齡東來，識量與德慧過人，時以光國族、利人羣、惠澤廣敷為己任。滿清暴虐，有志之士，紛紛奮起，會國父孫先生自檀香山赴香港經日本，途中邂逅，引為知己，時先生年僅二十九歲。顧橫濱尚有清廷領事，雷厲風行，巽儒者非常之原，避不敢納交，先生獨與二三同志為之置驛館，召徒侶，聲金加盟，為我僑倡，由是革命情緒瀰漫於東南亞各州島；而民國由是肇興，先生功不可沒焉。……自共黨構難，傾覆我守土，蹂躪我人民，

先生附髀櫻心，誓不與共天日，恨庸衆首鼠兩端，縱敵為患，特毅然振起義聲，以反共抗俄為僑民救國自救之先導。蓋其心存宗國，不以時移地異而稍渝。……」可謂蓋棺定論。

治喪委員會於四十四年四月六日午後一時至三時，在橫濱華僑總會舉行公祭後出殯，當時總統蔣公特題：「忠黨愛國」四字懸掛靈前，陳副總統、總統府秘書長及五院院長與各部會首長，以及日本友好如外務大臣重光葵、國會議員楠橋渡等，都致送輓詞聯和函電弔唁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除由秘書長張厲生電唁溫先生家屬外，

並由黨部撥發治喪費。溫先生生平事蹟，則由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搜集表揚，以彰功德，飾終盛典，備極哀榮。

綜溫先生一生，純篤忠誠，持躬廉介，埋首苦幹，盡瘁革命，不顧身家，不計名利，為黨為國，至為堅貞。語云：「仁者壽」，溫先生盛德遐齡，克享近百，生死事小，他所留給我們的是那種奮鬥不懈的革命精神，始終不衰的愛國心，以及熱情認真的處世態度；這一切都是這位革命老僑遺留下給我們的寶貴典範，他的楷模將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，也將永為愛國華僑所矜式。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鵠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 合售台幣貳佰壹拾元

名作家褚問鵠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鄉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噩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瑣瑣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全書分裝叁冊合售貳百壹拾元，歡迎購閱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